

REN
B
I
S
H
I
D
E

REN BISHI

任弼时的故事

宋毅军 编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8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
laoyibeiwuchanjiugeemingjiagushih

5

目 录

从屈原故乡走出来的共产党员	(1)
从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0)
从中央苏区到湘鄂川黔苏区	(21)
从先遣西征团结会师到长途远征反对分裂的 斗争(上)	(32)
从先遣西征团结会师到长途远征反对分裂的 斗争(下)	(38)
从南下解决西安事变到东进奔赴抗日前线	(58)
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69)
从转战陕北到进入北京	(81)

从屈原故乡走出来的 共产党员

任弼时这个名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感到很陌生，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们，却十分清楚地记着。他在世上仅仅度过了46个春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却奋斗了整整30年。

中共中央曾这样评价他：“任弼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从1920年16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起到1950年46岁病故止，任弼时同志的三十年生命完全贡献于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特别是贡献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工作。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内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建设和领导红二、四两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艰险斗争中，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任弼时同志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任弼时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由于他对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受

到了全党、全军的热爱。”

任弼时同志去世后，作为任弼时的亲密战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给了他高度的评价。

为了纪念任弼时，毛泽东题词：

“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刘少奇题词：

“学习弼时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刘少奇还说：

“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任弼时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题词：

“学习他三十年奋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学习他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塞维克精神。”

朱德题词：

“弼时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和政治家，而且是青年最亲密的导师。他一生为革命奋斗的历史，永远值得后辈青年同志们学习。”

全国各地也都在沉痛地悼念着任弼时，和任弼时同龄的邓小平，在西南地区追悼任弼时的大会上致悼词。他沉痛地叙述了任弼时同志在三十年奋斗中给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然后又说，他的死使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最可尊敬、最可信赖的领导者，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极大损失。最后，

邓小平同志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我们的革命胜利，好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完成弼时同志的遗志，来补偿这个巨大的损失。

任弼时，一个响亮的名字，伟大的名字。我们追溯任弼时同志的人生足迹，会得到很多的启迪。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诞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现属汨罗市）唐家桥。

据任弼时的女儿回忆：

至父亲的祖父这一代，已进入19世纪中叶，清廷日渐腐败，统治已逐渐走向衰亡。但是与家庭官位称号逐辈下降相反，整个家族子辈奋发求学，大步追赶社会前进的步伐却日渐加快。

祖父这一辈，五服以内除早夭者外，兄弟姐妹共20人。都是跨世纪的一代人。他们中有的赶上清末科举考试制度的尾巴，也曾参考过，但未中。随即便在废八股、兴新学的潮流中纷纷投考新式师范学校，年龄大的便插入速成班。据不完全统计，这一代人，男子60%以上离家或赴县城，或赴省城就读，女子在省城受中等教育的也近30%。更有不但走出了家门、县门、省门，并且走出了国门，成为享誉中华的教育家、学者、工程师。

任弼时的父亲思想开明，性情温和，母亲勤劳持家，贤良忠厚。父母对子女和蔼慈祥，教育有方，使任弼时从孩提时候起就种下了爱国爱民思想的种子。

1911年，7岁的任弼时来到距家10多公里的任民小学读书。他品学兼优，博得学校和师生的好评。1918年

夏，14岁的任弼时怀着工业救国之志，完成了高小学业。中学学业是在明德、长郡中学等学校完成的。在中学期间，任弼时的爱国救国思想进一步发展，在目前得以保存下来的作文中，他的爱国、勤劳、自立、自振的思想火花，跃然于纸上：

“夫吾一国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而今，每任强国鲸吞鼓颐，蚕食张吻，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瓯之国家，遂成破碎之山河。……呜呼！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镞之丛体，芒刺之负背。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之地不能乎！”

他在题为《言志》的作文中，表达了以发展工业来兴国的主张：

“今之世界，乃战争之世界，战争非交绥之谓，举凡学术及物质文明之竞争皆是。而强国之道，莫贵工业。今中国之所以弱者，亦工业不发达之一端也。……处此危急之时，战不能，不战不能，无可如何，有心者能无陨涕，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以强我中国。”

不久，他在题为《富国论》的作文中说：

“富国之道，约有三端：曰节用也、振兴实业也，开采矿物也”，“在位者惟知厚取于民，淫佚骄奢，恣情挥霍，谓其为振兴实业也，则洋货充斥，土货滞销，而政府虚与委蛇，不知设法组织以提倡之；谓其为开采矿物也，则我国煤铁诸产甲于全球，而开采者寥寥。既不能开财之源，复不知节财之流，吾恐穷者益穷，而其乘机以崇权，逞势以割地，藉名以要款，且欣欣然沦为殖民地者比比皆是也。”

五四运动中，在湖南的任弼时和教师何叔衡于5月27日出席代表会，宣布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决定6月3日全体罢课。随后根据斗争需要，他又和淮阳籍的同学一起组成一个宣传团，回到家乡向民众宣传。

五四运动的历史洪流，把包括任弼时在内的一大批爱国热血青年从学校推向社会，从城市推向乡村，从挥斥方遒、针砭时政发展到投身实际斗争行列。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他立下了革命的志向，找到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向，他决心远去苏联学习。临行前，他给父亲寄去了一封家书，谈了自己的志向，劝慰父亲不要惦念。他写道：

“……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既专心去求学，一年几载，并不可奇，一切费用，交涉清楚，只自己努力，想断无变更。至若谋学上海，儿前亦筹此为退步之计，不过均非久安之所，此事既可成功，彼即当作罢论。”

信投出的当天，任弼时就和萧劲光、任作民等人登上邮轮前往海参崴。后又改乘火车，经过两个多月，总行程为3000余公里，他们终于到达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莫斯科。

从1921年7月9日任弼时到达莫斯科之日起，到1924年7月下旬他离开莫斯科回国，任弼时在莫斯科生活了3年。除了在东方大学（全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外，任弼时还参与了这样几件事：

一是1922年1月，任弼时第一次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国际性的会议——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包括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代表共148人（其中列席代表17人）。不满18岁的任弼时可以说是代表中比较年轻的。

通过参加这次大会，任弼时了解了远东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运动斗争的情况。大会通过的《宣言》，给任弼时以很大的鼓舞，因为《宣言》发出了这样的战斗口号：

“我们要对剥削中国的军阀宣战；我们要对日本武人和官僚宣战；我们要向诡诈式的美帝国主义和贪婪的英国投机家宣战。我们不得胜利，誓不休止！”

会议结束之后，任弼时和其他代表一起，参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向俄国资产阶级开炮的“阿美乐尔”巡洋舰，游览了冬宫。他们惊叹于冬宫的建筑艺术，同时更为苏联人民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所激励、感动。

二是为苏联布尔什维克党、革命人民的领袖列宁守灵。1924年1月21日，列宁因病不幸逝世，顿时，苏联到处呈现出悲痛的景象。任弼时赶制了一幅列宁遗像，悬挂在中国班里以示纪念。从1月22日至26日，莫斯科各界代表来到圆柱大厅，向列宁遗体告别。一天晚上，任弼时

也被告知去守灵。他默默地伫立在列宁遗体旁，眼望着鲜花丛中的列宁遗体，凝视着这位伟人坚毅、安详的遗容，禁不住地热泪涌出。守灵时间虽然很短，但给任弼时的印象却是终身难忘的。列宁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曾讲过的一段话，任弼时一直铭记在心中：“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之好的。”

三是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大会指出，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无产阶级革命“暂时退潮到来了”；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正在增长，同样出现了稳定的局面，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却方兴未艾。根据这个特点，各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前提下，整顿组织，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要把民族革命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结成联盟，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青年共产国际因此提出：东方各国应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领导青年作经济的、政治的、文化教育以及争取青年切身利益的斗争。这种团体，“不仅在组织上应当是独立的，而且应有自己特别的政治面貌”。青年共产国际所提出的这个主张，对于还没有建立革命的党团组织，或者还没有实现群众民族革命大团结的国家来说，无疑是积极的、适宜的。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建立，团已经有四年的斗争历史和一定规模，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反帝反军阀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有另建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必要

呢？

任弼时认为：在国共合作共同倡导国民革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当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深入群众，广泛地组织青年，教育青年，加强现有团体的建设，使国民革命的力量更加集中，步调更加统一，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外，另建组织。中国代表团以三比一的多数支持任弼时的意见。由于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主张来自青年国际，因此，任弼时说：如果真有组织的必要，这也并非青年团本身所能够决定的事，因为带有政治独立色彩的组织之实现，须得由党决定。

在此期间，任弼时还写了家书，邮给远方的亲人。关于在莫斯科的家书，至今仅仅保留下来一封。他在信中表达了对国家、人民乃至亲朋好友的眷恋。信中说：

父母亲大人及诸妹妹：

一月以前，曾寄单挂号信一封并附有照片，可否收到？你们近来的健康如何？

我在莫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自当谨慎，你们尽可放心。

莫城天气渐暖了，街衢的积雪渐融化了。树木快发芽了，春天快到了。一年最快乐的光天天天接近起来。我现在正筹备着怎样好好的度过这种时光，结果如何，待将来再告。

在中国已是春季，我记着我们乡下的春景，鲜红的野花，活泼的飞鸟，何等的有趣！可恨远隔异土，不能与你们共享这种幽乐！但我不惜！因为以后我们共享的日子还

多。

禹彝叔去年由法来俄，现与我们同校念书，他的情形还好。

我今天本来是没话可寄，不过因为有便人回国，特草数行以慰你们的望念，旁不多及。

此祝健康，近好！并望回音！

各亲属叩安

二南寄于莫城

三月十五日

这里的二南是任弼时的父亲给他起的号。莫城是指莫斯科。在苏联期间，任弼时等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时间是1922年12月。这标志着年满18岁的任弼时跨入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此前，他于1920年8月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从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任弼时是中国社会主义(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24年8月他从苏联回到上海后,先是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大学担任“俄文教授”,随即参加了青年团中央的工作。数月后,相继担任了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团中央代理总书记、团中央总书记。

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任弼时先后为《中国青年》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两文,为《新青年》翻译了列宁的《中国的战争》一文。在介绍苏俄的革命和青年团方面,任弼时接连写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列宁与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治经济状况》等文章。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中国青年》一连发表任弼时的4篇文章。

针对国民党右派的攻击,说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是想控制国民党,提出要取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把它合并于国民党。任弼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中指出:青年团是“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斗争的青年组织,它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所以

它绝对不与一班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妥协”，它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欲使现有的国民党真正变成一个能担负国民革命使命的政党，以图国民革命早日的成功”，而国民党右派竟然“费许多的光阴和经费印出许多印刷品来攻击他们，这真是令人为国民党惋惜的事”！

在《苏俄与青年》一文中，他客观介绍了联共（布）和苏联政府对青少年的关怀和青少年在城乡革命和建设中的锻炼和成长，指出：“这种下层青年之培养，实为苏俄近年最可乐观的事，十五年后的苏俄，将有思想行为均健全的一般青年为真正共产社会建设的新基础。这是苏俄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企望。”正因为如此，使资产阶级深感畏惧。因为苏维埃政权可以用武力推翻，而无数用共产主义精神培养起来的“小东西”，是没有法子推翻的。任弼时怀着对培养教育一代无产阶级新人的使命感，开始从事青年团的建设工作。当时，有一场争论，即中国要不要按青年国际的建议，在中国青年团之外再建立一个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组织。任弼时认为，“绝对不应该成立新且独立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他系统地列举了以下理由：一是，国民革命运动需要集中力量，“共产党及青年团应在国民党内部负国民革命指导之责”，“帮助它的发展”，而不是分散力量另建组织。二是，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既然有独立的政治纲领，组织上和共产党并列，“完全等于一个独立的青年政党”，而这样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青年都可以参加，它必然是成员复杂，政见不一，一旦革命深入，“反将成为一种反对革命的青年组织，则前途危险将更大矣”。三是，社会主义青年团

本身的建设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另建组织，“徒使我们自己组织上的技术工作加多，物质上和人才上的损失而已，并有因此而反轻视青年团内部应作的青年工人运动，和团内训练、纪律及国民运动工作之危险”。总之，不管从任何意义上，这样的组织“实是没有实现之必要”。历史证明，任弼时的主张是正确的。

在青年团组织工作方面，任弼时参加了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25年1月26日上午，具有历史意义的团的“三大”在上海开幕。任弼时代表旅莫斯科团组织出席大会，并参加了五人大会主席团。会议还成立了组织问题委员会、教育训练问题委员会、经济斗争委员会、非党青年运动委员会等。任弼时成为教育训练委员会和经济斗争委员会的成员。

经过五天会议，大会通过了宣传、组织、团的教育和经济斗争及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等决议案，并按照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提出了“学习列宁主义”、“严守团体纪律”、“参加实习工作”、“获得青年群众”等口号。大会还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月30日，大会选出张太雷、任弼时、恽代英、贺昌、张秋人、刘尔崧、涂正楚、刘伯庄、夏曦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由张太雷、任弼时、恽代英、贺昌、张秋人五人组成。张太雷任总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主任。

从此，任弼时辞去了上海大学的工作，专门从事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工作。

大会以后，任弼时对团组织建设问题作了许多阐述。他说：“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

在思想路线上，任弼时强调要“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庶可得到思想上的胜利。否则，对于我们的发展有很大的危险”。

与此同时，任弼时也意识到实际工作的经验不足，认为自己在莫斯科的学习多是普遍的理论，没有注意对实际的研究，所以，他在给莫斯科学习的同志的信中写道：

“此次回国同志……从工作中可以看出，多是缺少实际经验，尤其是对于很普通党团及工会组织工作，因我们在莫时没有注意实际研究，以致不够应用，甚至较国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玄空的理论，事实上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是没多用处，至多能做点文字宣传上的帮助，然做文章看书又没有时光，且空空普遍的理论，我们出版的刊物上也不觉得十分的需要，这是我们所感觉而感困难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你们能多将党团、工会等组织教育等经验以后能多注意，因为你们恐怕也快要回国的了。”

可以看出，此时的任弼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地结合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这个重大问题。随之而来的五卅运动的滚滚洪流，给了任弼时以战斗的洗礼。在运动过程中，任弼时撰写战斗檄文，到工人训练班中讲课，以主要精力研究斗争策略，指导运动深

人发展。这次运动使 21 岁的任弼时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任弼时等负责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共青团组织在五卅运动后有了巨大的发展。据 1925 年 9 月统计,全国团员人数已由 1925 年 1 月“三大”时的 2400 多人发展到 9000 多人,增加了 2.7 倍,其中工人成份由原来不到 10% 增加到 38%。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参加罢工的 55 万工人中,青年工人占一半以上。

1925 年 5 月,任弼时为团中央代理总书记,7 月,为共青团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他在努力使团的工作青年群众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9 月,任弼时在北京主持召开共青团中央三届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以“深入群众”为中心口号,要求各级团组织“在宣传上、组织上、实际斗争中去深入群众”。任弼时重申,共青团组织应当做到:第一,“组织群众、扩大组织”,号召广大群众在我们口号之下奋斗,将其中觉悟的分子吸收到我们团体里面中来,使我们经常能有组织地影响于他们。第二,“战胜反动派的理论,以取得群众的信仰”。党团组织在理论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怎样使全国无产阶级具有纯粹的阶级思想,在各种行动斗争中,去批评反动思想的错误。第三,“领导群众为其本身利益而斗争”,使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团体,从而取得其信仰。

在组织方面,任弼时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决定,将团组织中的骨干输送到党组织中去。任弼时说:“我们要知道,若是党的组织不能扩大,则政治工作和工人及农

民运动不能充分地发展,仍然是使团没有发展的机会。反之,如党的组织扩大,各方面工作发展,则我们持有深入青年群众的更好机会。因此,党团分化的工作,我们应毫不犹豫地切实执行。”五卅以后,全国党组织人数已达3000多,而团组织则有9000多人。为了壮大党的组织,特别是在重庆、大连、福州、南京和西安等空白地区建立党的组织,任弼时等领导各级团组织特将年龄在20岁以上的团员全数推荐入党;年龄超过23岁的团员完全脱离团组织,输送给党;不满20岁但能干的团员也须推荐入党。这样,全团共有3000多名团员输送给党组织,占全团人数的1/3。为了使机构精简,工作集中统一,团中央的领导机关作了调整:一是设立经济斗争委员会,取消工农部,使发动青年工农的工作由各级团委“全部负责”。二是调整组织、宣传两部的工作职能:将团组织内部的训练、教育工作统一归宣传部管理;有关工农、学生、妇女、军士及群众运动等组织统归组织部,取消学生、妇女、非基运动等部,必要时可组织各种委员会。这样,各级团委由书记及组织、宣传、经济斗争委员会和学生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共5人组成。团中央执委分工由任弼时任总书记,林育南任组织部主任,恽代英任宣传部主任,涂正楚任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刘昌群任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兼非基运动委员会书记,原工农部主任贺昌兼任上海地委书记。

1926年4月,对于任弼时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月份。在组织的帮助下,他和自己在家乡的未婚妻陈琼英结婚了。70年后,任弼时的女儿在《我的父亲任弼时》一书中,曾这样记述着任弼时和陈琼英这对革命伴侣: